

watch | 上证观察家

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经营影响有限

当前央行实施的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为主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并没有改变银行资金面持续宽松的局面,对银行经营环境的影响有限。但是央票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对银行贷款存在挤出效应,商业银行资金运用压力有所增加。总体来看,商业银行不必过分担心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应抓住经济快速发展、金融环境较为宽松的良好发展环境,加快各项业务的发展。

□胡妍斌

近期央行不断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央行票据的发行量,现有货币政策是否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产生影响。商业银行对此应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牵引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出于比较优势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需求,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而把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留在了本国。在这种国际生产力布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使得中国处于制造业的终端,承担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下的转移顺差。由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低消费,高储蓄。高储蓄带来的是高放贷和高投

资,在国内消费不足的状况下,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出口来释放,出口导向政策就促成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在国际国内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外汇储备每年新增数量逐年上升。

外汇储备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2年的46%,提高到2006年的62.5%。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是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表现,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假以时日,没有一定的时间是难以到位的。这两大因素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将在较长周期内长期存在,推动外汇储备持续增长。

在主动投放基础货币的时候,中央银行会把社会的超额储备的流动性控制在尽可能少的数量上。各国通行的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也使得商业银行尽可能保留最低超额准备金率。但是在我国,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使央行被动地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这些基础货

币已远远超出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量。据测算,每年维持经济增加、贷款增长、M2增长16%左右,需要投放基础货币约在5000亿元左右。2002年以后,由于外汇储备增加较多,同时又要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央银行被动收回外汇而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外汇占款的增量已远远超过了所需的基础货币的增量。基础货币的过度投放会通过乘数效应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贷款增长过快,投资增长过快。因此,外汇占款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需要由央行对冲掉。当前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等工具主要在于抑制流动性过剩,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紧缩”。从央票发行后的结果来看,2002年以来基础货币的增长额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商业银行的实际经营环境仍然偏松。

当前央行实施的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为主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并没有改变银行资金面持续宽松

的局面,对银行经营环境的影响有限。但是央票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对银行贷款存在挤出效应,商业银行资金运用压力有所增加。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紧缩性货币政策并未影响商业银行整体较为宽松的资金面环境。尽管央行采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紧缩性政策回收流动性,但是外汇占款的增加额仍然大于基础货币的增加额,银行体系超额流动性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率仍较充裕。银行信贷扩张具有充裕的资金基础。在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利率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将不愿意保留过多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而是将多余的存款用于发放贷款或是购买证券,导致银行体系存、贷款规模迅速增长。从实际经营情况来看,2002年以来,商业银行存贷款规模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存贷比不断下降,银行体系并不存在资金面紧张的情况。

第二,央票对银行贷款增长

存在挤出效应。尽管资金面较为宽松,银行的放贷冲动较强,但近年来,贷款增长始终低于存款的增长,银行体系存款贷款差不断扩大,存贷比不断下降。商业银行持有央行票据对贷款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以2006年为例,2006年人民币资金运用从2005年末的30万亿上升到36.5万亿,增加了6.5万亿。其中金融机构的贷款从19.5万亿元增长到22.5万亿元,增加了3万亿元;商业银行持有的央行票据从7.4万亿元增长到9.9万亿元,增加了2.5万亿元;持有的国债等有价证券从3.5万亿元增加到3.9万亿元,增加了0.4万亿元。央票与信贷扩张的规模基本相当,央票的发行对银行信贷的扩张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

第三,一定程度上增加银行资金运用压力。受央票挤出效应的影响,加上金融业股票融资、债券融资进一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银行贷款资金的依赖,近几年贷款增长率明显低于存款增长率,银行体系存差规模不断扩大,银行资金运用压力有所增加。

总体来看,商业银行不必过分担心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应抓住经济快速发展、金融环境较为宽松的良好发展环境,加快各项业务的发展。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政府需加快转型

□王清平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部门的专家近日完成的《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指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平。报告认为,我国政府对公共支出的绩效考评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未形成政府公共支出讲效益的制度环境、监督环境,未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评价体系。

我国公共服务为什么水平较低?根源在于政府的定位。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始终是我国各级政府的核心工作,我国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也是以GDP数据为主要指标,因而,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等经济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公共服务。但是,现代政府的最核心工作应该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发展经济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

因此,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建立公共型服务政府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其核心就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即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以解决公众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而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所产生的矛盾。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尤其在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政府能否提供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不仅决定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需要政府加快转型步伐,从投资和形成国有资产的基本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职能转变,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利益和公共需求。

但是,目前,由于没有对政府的职能部门进行明确定位,政府转型的步伐尚跟不上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步伐,许多地方政府仍在把经济工作作为核心,而把需要由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公共服务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不能决定的,它需要政府承担起更多责任。

政府要实现转型,必然首先从制度设计上入手,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并重新构建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机制,以引导和鼓励政府官员以民生问题为重、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为重。一旦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能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实现自身价值,同时也增加国家税收,为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条件,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提高资源税税率势在必行

□吕青

实际上是下降了。

美国的石油资源税每吨超过130美元,相当于我国石油资源税的近34倍。即使不参照美国的标准,而参照我国过去的资源税标准,如果按照每吨原油价格为300元时资源税为每吨8元的标准来算,我国目前的资源税也应该提高到每吨80元。显然,我国的资源税太低了。

对我国在海外上市的油企而言,资源税过低等于给境外投资者巨大的隐性补偿,我国油企得到的其他优惠待遇也都通过上市公司拱手送给了境外投资者。在海外投资者分享我国廉价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同时,资源所在地民众却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过低的资源税导致我国迟迟无法建立起系统而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并且,还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发展差距。

资源税过低导致资源被廉价甚至无偿使用,带来企业成本的外部化和社会化,导致对环境和生态的双重破坏。同时,由于资源税偏低,直接导致了矿业开采行业进入门槛低,造成矿业安全事故频繁发生。

税率是税制的灵魂。由于我

国资源税的单位税额偏低,资源



税无法有效发挥调节作用。并且,较低的资源税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相关资源的价格过低,导致了严重的浪费。

而在西方国家,资源税税率与资源产品利润是紧密相关的,资源税的税率体系随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石油开采利润非常丰厚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就不断随着市

场变化调高石油资源税。

我国资源税的范围也应该

扩大。我国最初推出资源税的时候,只对几类矿产品征收资源税,与发达国家相比,征税范围比较窄。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导致那些没有征税的资源浪费严重,同时也造成了市场不公,因为在诸多资源类产品中,被征税的资源与不征税的资源之间的差异直接影响了相关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资源税改革,不仅要调整税率,也应该适当考虑扩大征税范围,以使资源的稀缺性特点得到充分体现。

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影响股市作用有限

□鲁宁

下一个周一,国内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再次上调0.5个百分点。今年1月、2月及4月,央行已3次推出同一举动。加上3月份提高存款利率,央行每个月都没有闲着,金融杠杆舞动了4次。

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而且,很有可能以后还会进行调整。对此,虽说“股嘴”们不断出来解释,但由于解疑释惑不够通俗,许多热衷于炒股的投资者,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所谓存款准备金,指各家银行为保证储户集中取存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归央行保管的那笔存款。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笔钱主要用于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的金融挤兑。打个比方,若某一天,市民突然集中到银行取钱,银行存款大头又都贷了出去,若没有一笔准备金放那儿应急,银行就难以应付市民集中挤兑,银行随之就会出现信誉危机。所以,通俗地讲,存款准备金可视同为银行信誉保证金。

搞市场经济了,存款准备金

的作用边界也随之扩大,除了信保保证以备应急的作用以外,它更多作为央行调控各家银行贷款扩张的常用政策工具之一。打个比方,某家银行吸收1亿元,假如存款准备金是10%,它最多只能放贷9000万元。若存款准备金提高到20%,放贷上限则压缩到8000万元。所以,存款准备金相当于银行放贷上限的紧箍咒,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总额的比例)隐喻紧箍咒的松紧程度。

央行连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因为一季度贷款增长过快,拉动CPI(消费价格指数)“心动过速”(一季度达到2.7%)。CPI与百姓就直接有关了,这玩意儿过高,百姓尤其是底层群众的生活会受到直接影响。贷款过快又与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有关。

流动性过剩也挺抽象的,通俗地说,就是银行里和社会上流通的钱过多。钱是怎么多的,分分几大块:一块是外贸顺差带来的,外贸用美元结算,而人民币与美元不能自由兑换,为确保出

的企业的苗头施以重拳扼杀。眼下的炒股资金,主要来自两大块:一块是中小散户的自有资金,相当部分是多年的储蓄款。就算继续出现“储蓄搬家”,其对银行的影响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影响是大致相同的,即多少起到抑制银行放贷冲动的作用。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恰好说明银行放贷资金过剩,所以才有放贷冲动。

因此,此举不至于影响银行业绩而波及金融股整体。另一块是越来越多的基金,基金是股市资金的主力,其来源很大一块还是基金购买者(包括自然人和社会法人)的自有资金。这样分析下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对股市的冲击通常是十分有限的。

总而言之,经济全球化促使中外金融制度对接日益加快,央行用金融政策杠杆的“品种选择”和使用频率呈增多、越快两个趋势。换句话讲,舞动金融杠杆与百姓生活包括切身利益的关联日益紧密。因而,主动学点金融知识当成为普通投资者知悉更新的一项内容,有利于“趋利避害”。

voice | 上证名记者

银行难道不是企业吗

□倪小林

银行是不是企业?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国内那么多银行上市发行股票如果不是企业,那这些银行上市就不好解释了。但是在银联卡跨行收费的问题上,银行的做法不得不令人疑惑:银行难道不是企业吗?

按理企业对于自己的经营行为有自主选择权,收费也罢不收费也罢,都是依照企业的成本核算,依照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来制定营销目标。如此一个经营性收费问题,从两会上被代表委员们质疑开始,百姓的意见很一致,最后银联不得不服从大众用脚投票的结果。

但是,事情好像并没有结束,银行业协会在发出取消通知的时候,那一番意味深长的表白在告诉人们,其实跨行查询收费是完全应该的,只是现在大家不接受,银行不得不“赔本赚吆喝”了。

果真如此吗?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国内资银行中也有很多特例,比如民生银行从来不收取跨行查询费用,在全国很多银行异地取款手续费的时候,浦发银行一直不收任何手续费。同样是银行,为什么有的一定要从储户手里收取费用,有的银行则可以自我消化这些同样的服务成本,有的银行理直气壮地认为只要我为储户服务了,手续费是理所当然要收的。我们循着这样逻辑不得不认为,那就是说有的银行经营成本高,有的银行管理到位经营成本低,经营成本高的企业必定没有办法内部挖潜来提高企业效益,只好把盈利的目标放在诸如收费等项目上,而那些在市场上竞争力比较强的银行,就会很有自信地将经营目标放在创新服务产品和降低门槛上。

当然,银行人士对此有不同的说法,我国的股份制银行是后起之秀,也就是诞生比较晚,它们为了进入市场,不得不降低自己的门槛,在经营上千方百计开发新品,而且还降低门槛吸引客户。如果这个推理论成立,也就正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如果说新生的股份制银行可以跨行查询不收费、异地取款可以跨行收费这样的问题都处理不好,面对复杂的市场竞争,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偷逃税款不能一“补”了之

□冯光明

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共有59万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据此推算,隐瞒利润行为所造成的税收损失难以估量。

但是,无论是2006国家税务总局对全国房地产企业的专项检查,还是去年财政部对39家房地产企业的检查,都没有发布对偷逃税款者依法惩处的消息,公布的只是补交税款,而有的富豪甚至连税款都拖着不交。去年10月,媒体就披露,广州一位拥有100亿元身家、排名胡润百富榜第十位的开发商,“连续几年欠下巨额税款,至今达2800万元”。

从有关部门检查和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房地产业偷逃税款现象比较严重,房地产业因此被称为“财富的巨人、纳税的侏儒”。房地产业是真正培养富豪的行业:在福布斯中国内地首富排行榜中,主要从事房地产业的亿万富豪逐年上升,2001年前10大富豪中有5位开发商,2002年,25人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开发、近一半人涉足房地产业;2003年,经营房地产业的富豪增至35人;2004年,富豪榜上的房地产业富豪升至45人。

然而,房地产业的纳税额却少得可怜。2005年,国税总局公布的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前300名内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500强中也只有一家。2006年9月2日,国税总局发布的“中国纳税500强”企业中,房地产业的数量仅占0.6%,纳税额仅占0.3%。

房地产业成为纳税侏儒与隐瞒利润、偷逃税款的行为密切相关。财政部去年11月3日通报了对39家房地产企业进行检查的结果:这些房地产企业资产不实93亿元,收入不实84亿元,利润不实33亿元,有的房地产企业刻意隐瞒的利润率最高达57%。39家房地产商隐瞒利润33亿元,按照3.3%的所得税税率,偷逃税款就是10亿多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根据《第一次全国